

对铜镜实用功能的忽视

——与《镜与中国传统文化》作者商榷

范淑英

摘要:刘艺所著《镜与中国传统文化》一书,忽视了铜镜的日常生活作用。从铜镜的实用功能出发,铜镜首先是一种具有特殊功能的日用品,其次才是社会习尚的载体,首先是照美丑的器具,其次才是被附加了神异性的宗教器皿。在古代传统文化研究中,重习俗、宗教而轻实用功能的倾向,会使我们对传统文化的性质认定偏离事实。

关键词:铜镜; 宗教; 实用功能

中图分类号: K87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62(2009)05-0095-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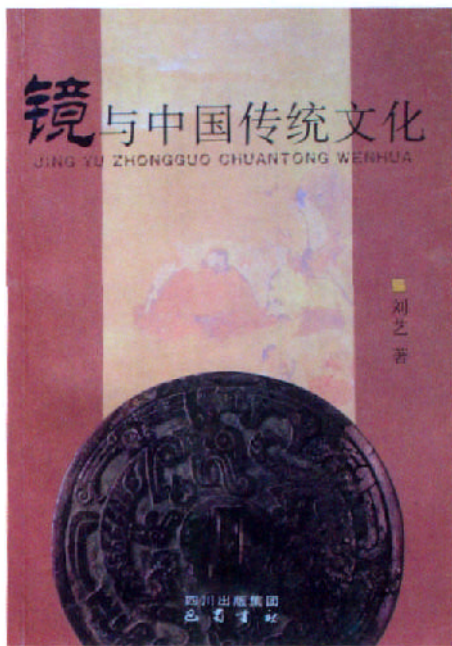
刘艺所著《镜与中国传统文化》^[1]是近年来镜文化研究的一部力作(图一)。作者为文学博士,书中搜集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对镜在古代中国社会生活中的功能进行了细致深入地解析。除文献资料全面翔实外,考古资料、民俗资料的补证,尤其是文化人类学阐释使得该书既不同于以往铜镜的考古学研究,也不同于民俗学、文献学著作。全书30余万字,但内容集中,主要分为“镜文化与民俗”、“镜文化与宗教”、“镜文化与小说”三部分,其中第三部分以小说为例论述了镜与民俗、镜小说中的宗教情结等与前二部分相关的内容,因而该书是目前所见有关铜镜在古代中国人习俗信仰方面资料最详、研究最深的一部学术著作。

但是,由于该书的重点放在习俗与宗教信仰方面,忽视了铜镜的日常生活作用,加之所引用的文献资料年代跨度大、涉及的地域范围广,多学科交叉及研究方法的多样,在某些资料的分析处理上仍存在可商榷之处。

本文拟从考古资料入手,就该书第一章《镜文化与民俗》中的第一节“镜与生命及其永恒”、第二节“镜与婚嫁”、第三节“镜与丧葬”的内容,从铜镜是古代日常生活用品的角度出发,提出一点不同看法,希望在镜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中给予铜镜的实用功能以必要的关注。

一 是社会习尚的载体还是特殊功能的专用品

中国古代铜镜有以文字作镜背装饰的作法,镜铭因为反映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受到研究者的普遍重视,《镜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多次引用镜铭作为立论的根据,尤其在镜与婚嫁、镜与长寿和子嗣繁衍的论述上表现得极为突出。鉴于镜铭中有表达爱情、祈求长寿的文字,作者更进一步得出镜为爱情信物、镜为祝寿用



图一 《镜与中国传统文化》封面



图二 博局纹镜

铭文：“尚方之竟(镜)大佳好,上右(有)山(仙)人不知老。渴饮王(玉)泉饥食枣,浮游天下敖(遨)四海,徘徊(徊)大山采之(芝)草,寿如今(金)石,国保,乐未央,宜羊(祥)。”



图三 草叶纹镜

采自程林泉、韩国河：《长安汉镜》图版十一.1,陕西人民出版社(西安),2002年。铭文：“见日之光,长毋相忘。”



图四 “长毋相忘”瓦当

采自姚生民：《汉甘泉宫遗址勘查记》，《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2期。



图五 瑞兽纹镜

铭文：“照日菱花出,临池满月生,官看巾帽整,妾映点妆成。”

品的观点。但是,如果仅从镜背铭文出发,不考虑铜镜在古代生活中的主要作用,对镜铭的理解以及建立在其上的结论则会失之偏颇。

毋庸置疑,铜镜是日常生活用品,观容照貌是第一位的,照镜的目的是为了端正姿态、装扮容貌、美化生活。《韩诗外传》曰：“夫明镜所以照形也。”^[2]作为生活必需品,铜镜的获得主要有以下三条途径:土贡、赏赐、买卖。以唐代为例,唐朝皇室铜镜主要依靠土贡(《新唐书》卷三十七——四十三《地理志》中提到的贡镜地有扬州、太原)功臣、贵戚虽然可从皇室赏赐中得到铜镜,但多数铜镜应和一般官吏、平民一样从市场通过交易得来。施肩吾《途中逢少女》诗曰:“身倚西门笑向东,牡丹初折一枝红。市头日卖千般镜,知落谁家新匣中。”^[3]诗中所写的少女应是在商肆中买卖铜镜的商人,从“市头日卖千般镜”来看,每天的销售量是很大的。在唐代不仅商肆买卖铜镜红火,私下交易也很频繁,唐代笔记小说《广异记》记载:

韦栗者,天宝时为新淦丞。有少女十余岁。将之官,行上扬州,女向栗欲市一漆背金花镜。栗曰:我上官艰辛,焉得此物?待至官与汝求之。岁余,女死,栗亦不记宿事。秩满,载丧北归。至扬州,泊河次。女将一婢持钱市镜,行人见其色甚艳,状如贵人家子,争欲求卖。有一少年,年二十余,白皙可喜。女以黄钱五千

余之。少年与漆背金花镜,径尺余。别一人云:有镜胜此,只取三千。少年复减两千。^[4]

“行人见其色甚艳,状如贵人家子,争欲求卖。”描述了扬州城内个体商贩街上兜售铜镜的情景,买主可讨价还价,由此可见铜镜流通环节上存在着竞争。

在生产环节上,铜镜也表现出商品所蕴含的竞争意识。从汉代镜铭中可见,汉代有官府制镜作坊“尚方”(图二),还有许多民间制镜匠师。无论是官府作坊,还是民间匠师,都在极力宣传自己的产品,诸如“尚方作镜真大巧”,“许氏作镜自有纪”,“朱氏明镜快人

图六 长沙窑褐彩“君生我未生”诗文壶

采自李效伟：《长沙窑——大唐文化辉煌之焦点》，第25页图42,湖南美术出版社(长沙),2003年。



图七 连弧纹镜

采自《练形神冶莹质良工——上海博物馆藏铜镜精品》第166页图46。铭文：“长宜子孙”、“寿如金石佳且好兮。”

意”；“至氏作镜真大巧”；“龙氏作镜大毋伤”等等，凸现出商品经济下的品牌意识^[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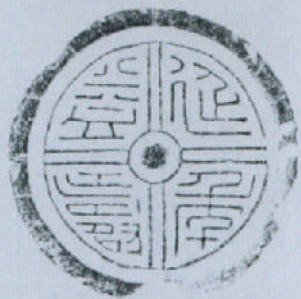
作为商品进行生产和流通的铜镜，为了迎合市场，常在花纹和文字的设计上满足买者的心理需求，以各种美好的祝福和对购买自己产品的好处功效的渲染来吸引顾客。这时候，铜镜以及其它商品就成为社会时尚的载体，并不一定就是具有某种独特功能的专用品。

以表达爱情主题的镜铭为例，《镜与中国传统文化》列举了以下汉镜铭文说明镜与婚嫁的关系、镜为爱情信物的观点：“见日之光，长毋相忘”（图三）“见日之光，天下大明，千秋万世，长毋相忘，宜侯王”、“长相思，毋相忘”等等。但是除了“二姓合好，□如□□，女贞男圣，子孙充实，姐妹百人，□□□□，夫妇相□□□□阳□□月吉日，造此信物”^[6]的铭文表明其镜是专为婚姻而造的信物外，其它铭文也见于考古出土的汉代其它物品上。比如，陕西淳化汉甘泉宫遗址出土了“长毋相忘”瓦当^[7]（图四）；新疆尼雅遗址出土过东汉“王侯合昏岁宜子孙”汉文织锦^[8]。隋唐时期，镜铭中虽出现了情诗，《镜与中国传统文化》列举如“月样团圆冰样清，好将香阁伴闲身，青鸾不用羞孤影，开匣当如见故人”^[9]等，而“照日菱花出，临池满月生，宫看巾帽整，妾映点妆成”的镜铭^[10]（图五）更将男女情爱的表达跃然镜上。但隋唐其它商品中也见有类似的装饰。1983年长沙窑发掘出土了大量有釉下彩题诗的瓷壶，诗歌多为五言四句。题诗的内容最多的是吟咏离愁别绪和伦理道德的，但也有四首情诗，其中一首为：“君生我未生，我生君以（已）老。君恨我生迟，我恨君生早。”（图六）有14件瓷壶上题写了此诗^[11]。如果说诗人的吟唱还只是个人行为，那么将诗歌书写在商品上面在街市流通，则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普遍心理。这些瓷壶多出土于蓝岸嘴T₃第三层的晚唐地层中，我们从唐代文献中未见以瓷壶作为男女爱情信物的记载，但不排除生产者题写情诗吸引青年消费者购买的目的。

同样，汉镜中出现大量祈求长寿富贵、子孙繁衍的铭文（图七），也并不一定代表了铜镜就是祝寿



图七



图八 “延年益寿”瓦当



图九 “千秋万岁”瓦当



图十 “亿年无疆”瓦当



图一一 “延年益寿长葆子孙”汉文织锦

采自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95MNI号墓地M8发掘简报》，《文物》2000年第1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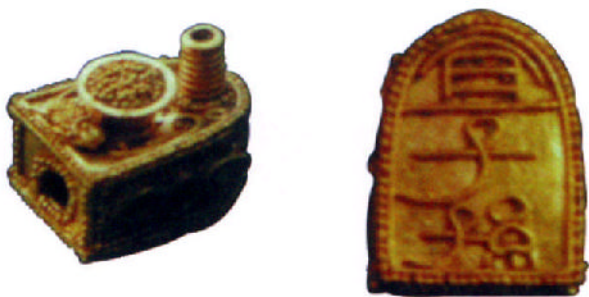


图一二 “千秋万岁宜子孙”汉文织锦

采自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 95MNI 号墓地 M8 发掘简报》,《文物》2000 年第 1 期。



图一三 双鱼纹铜洗(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图一四 金灶

采自刘云涛:《山东莒县双合村汉墓》,《文物》1999 年 12 期。

专用品或具有保佑子嗣的专门功能。汉代瓦当中就有大量此类寓意的文字,如“长生无极”、“长乐未央”、“长生未央”、“与天无极”、“延年益寿”(图八)、“千秋万岁”(图九)、“亿年无疆”(图十)等。仅在河南郑州西北郊古荥城址出土的就有“惟天降灵延元万年天下康宁”、“长乐未央千秋万世昌”、“长乐未央大富之当如意”、“千秋万岁”、“长生无极”等吉语瓦当^[12]。砖室墓中也有“大吉”^[13]、“子孙千亿皆寿万年”、“富且寿考”、

“宜子保孙”、“皆宜价市”等吉语砖^[14]。而汉晋织锦也有以类似内容作装饰的,如“延年益寿大宜子孙”、“延年益寿长葆子孙”(图一一)、“(与)世母极锦宜二亲传子孙”、“千秋万岁宜子孙”^[15](图一二)等;汉代日用容器上,也可见此种手法的装饰,如铜洗上常有两条鱼,中间嵌有“君宜子孙”四字(图一三);另外,山东莒县双合村汉墓出土的一件金灶上,底部也有篆书“宜子孙”铭文(图一四),该金灶嵌有绿松石,小巧精美,上面鑿有小孔,应是随身佩戴的饰物^[16]。这些器物上的铭文与镜铭一样皆反映了当时人们对长生不死的追求和对平安富贵、家世繁衍的祈愿,人们把这种愿望诉诸于很多与生活联系密切的物品之上,因而铭文应是社会习俗的反映,并非装饰有铭文器物就具有了专门的功能。

二 是照妖还是照美

《镜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搜集了大量镜子的神异性及其特殊用途与功能的资料,左右了作者的思考方向。这些资料多出自笔记小说等文学作品和宗教文献,以夸大镜的功能和营造神秘氛围来吸引读者和信众,虽然作品中仍有生活的影子,但重点不是渲染铜镜的实用性,而是着力加深镜乃神器的宗教意识。所以,依靠这些材料,书中对于铜镜与民俗的研究突出了铜镜的辟邪、照妖、占卜、医疗及丧葬功能,这些功能的论述和分析改变着我们对古代铜镜乃日常生活用器的认识,禁不住让人发出铜镜是照妖还是照美的疑问。

尽管实用性不是作者研究镜文化所涉及的内容,但在具体分析时,应有所考虑,试以“镜与丧葬”为例加以简要说明。

从考古发现的情况看,古代的铜镜绝大多数出自墓葬,自然让人将镜与丧葬联系起来,但在中国历史上丧葬文化极为复杂。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丧习既有相似性,也有差异性。总的来说,丧葬是人类灵魂观念的产物,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将墓葬视为阴宅和来世生活的场所,即“墓为真宅”^[17]。这种思想不仅可以从汉唐时期以至后来将墓叫作“宅”、“堂”、“室”、“室宅”的称呼中得知,而且可以从古代墓葬中埋藏众多的生活日用品和粮食的做法中见到,所谓“事死如侍生”。那么,大量铜镜虽然埋在墓中,但它们非为丧葬而制作的冥器,绝大多数是墓主生前使用过的物品,尽管出自死后的墓葬,也应反映着生活的内容,即便是墓室四角置镜、棺上悬半镜、墓室顶部悬镜等特征鲜明的丧葬用镜,有的也是生活的映射。比如,北方宋、辽、金墓中有在墓室顶部藻井中心悬挂铜镜的,《白沙宋墓》^[18]、《洛

阳邙山宋代壁画墓》^[19]、《山西汾阳金墓发掘简报》^[20]、《甘肃临夏金代砖雕墓》^[21]、《河北宣化辽张文藻壁画墓发掘简报》^[22]等都有报告。这些墓葬多仿木构建筑的功能布局。《营造法式》卷八《小木作制度·小斗八藻井》条记载“顶心之下施垂莲或雕华云卷,皆内安明镜。”^[23]《营造法式》是北宋官方的营造制度和技术,既然汴梁一带的地面建筑有藻井挂铜镜的习俗(不排除有辟邪的功用和象征日月的目的,此目的与墓室顶部施镜相同),那么墓顶悬挂铜镜,很可能是仿照地面建筑的做法。

相比于棺外置镜,棺内置镜的方式不仅延续时间长,而且在各个地区较为普遍,古代墓葬中出土的铜镜约一半以上出自墓主人头部周围^[24],魏晋至唐墓中随葬铜镜还有常和铁剪、铁镜或铁块伴出的现象,这些现象引发了学者对丧用镜的思考,但如果把铜镜孤立于棺内与铜镜共存的瓷砚、陶瓷容器、铜器、金银器等日常器具之外进行考量,则势必会夸大铜镜的丧葬功能,而忽略了它作为实用器具的一面。这是因为“古代墓葬中的随葬明器,很显然是有两套意义不同的明器:一种是专为死人而设置的迷信压胜之物;另一种是反映死者生前生活情况的奴仆、用具模型或其他器物。如何区别这两种明器,并进一步了解其不同的意义,对我们研究古代的葬俗及其所反映的社会情况是很有帮助的。”^[25]

近年来,对古代传统文化、艺术的研究有重习俗、宗教,而轻实用的倾向。这种倾向使我们对文化的多样性、复杂性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但同时,对实用性的忽视又会使我们的认识偏离历史的真实、生活的真实,从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性质认定产生误导。从这点上说,尽管有《镜与中国传统文化》这样集目前学术研究之大成的著作,多层面、多角度地深入进行镜文化的个案式探讨仍然是十分必要的。

注释

[1] 刘艺:《镜与中国传统文化》,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成都),2004年。
[2] 《后汉书》卷五十四《杨震附孙赐传》。
[3] 《全唐诗》卷四百九十四,第5600-5601页,中华书局(北京),1960年。

[4] (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三百三十四鬼十九《韦栗》,第2651页,中华书局(北京),1986年。文中所言“漆背金花镜”很可能是镜背髹漆贴金银片装饰的“金银平脱镜”。

[5] 参见管维良《中国铜镜史》第五章“五、汉三国六朝铜镜的社会学观察”之“7、商品经济品牌意识的社会体现”,第172页,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2006年。

[6] “长相思,毋相忘”见于《镜与中国传统文化》第42页,其它镜铭见该书第30-31页。

[7] 姚生民:《汉甘泉宫遗址勘查记》,《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2期。

[8] 于志勇:《楼兰——尼雅地区出土汉晋文字织锦初探》,《中国历史文物》2003年第6期。

[9] 《镜与中国传统文化》,第43页。

[10] 此镜铭应以男女照镜寓意恩爱。《南史》卷三十九《刘勉附子瑱传》载:“瑱妹为齐鄱阳王妃,伉俪甚笃。王为齐明帝所诛,妃追伤遂成痼疾,医所不疗。有陈郡殷蒨善写人面,与真不别,瑱令蒨画王形像,图王平生所宠姬共照镜状,如欲偶寢。瑱乃密使媪奶示妃,妃视画仍唾之,因骂云:‘故宜其早死。’于是恩情即歇,病亦除差。”

[11] 长沙窑课题组编:《长沙窑》,第143页,紫禁城出版社(北京),1996年。

[12] 张松林:《郑州市西北郊区考古调查简报》,《中原文物》1986年第4期。

[13]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省襄城县茨沟画像石墓》,《考古学报》1964年第1期。

[14] 麦英豪、黎金:《广州西郊晋墓清理报告》,《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3期。

[15] 其中1988年在楼兰发现的一件“延年益寿长葆长孙”织锦,幅边位置上,墨书有一行佉卢文字,印度学者R.C.Agrawada最新研究,认为该织锦上的佉卢文字,应释读为“有吉祥语的丝绸(织锦)”,表达了汉代人们对此类铭文的认识。见于志勇《楼兰——尼雅地区出土汉晋文字织锦初探》。

[16] 刘云涛:《山东莒县双合村汉墓》,《文物》1999年12期。

[17] 语出自开元二年诏令,见《旧唐书》卷八《玄宗本纪》,第174页,中华书局(北京)。

[18] 宿白:《白沙宋墓》,文物出版社(北京),1957年出版,2002年再版。

[19] 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邙山宋代壁画墓》,《文物》1992年第12期。

[20]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汾阳县博物馆:《山西汾阳金墓发掘简报》,《文物》1991年第12期。

[21] 临夏回族自治州博物馆:《甘肃临夏金代砖雕墓》,《文物》1994年第12期。

[22]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张家口市文物管理处、宣化区文物管理所:《河北宣化辽张文藻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1996年第9期。

[23] 转引自宿白《白沙宋墓》,79页注119。

[24] 王锋钧:《铜镜出土状态研究》,载《西安文物考古研究——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成立十周年纪念》,第71页,并参见第75页表一,陕西人民出版社(西安),2004年。

[25] 徐苹芳:《唐宋墓中的“明器神煞”与“墓仪”制度——读大冢原陵秘葬经札记》,《考古》1963年第2期,第103页。